



## 远去的说书声

■ 湖北咸宁 吴长海

小时候,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,村里每年除了放两三场电影外,其他的文化娱乐生活就没有了。但是,那时有一项比较奇特的娱乐活动,那就是打鼓说书。所谓“打鼓说书”,其实就是一个人表演。他一边打鼓,一边打着快板。打过一阵之后,“说书”就正式开场了。那时说书都是说的“古书”,什么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刚反唐》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之类。这些故事一般情况下都是不能“说”的,因为是“四旧”里的“旧文化”,是封建糟粕,属于禁止的范畴。

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,只有百十个人。村子尽管小,但每年都有公社工作组进驻,工作组成员在这里的时候,要想听打鼓说书,门都没有。只能在工作组回公社开会或休息时,才能偷偷请人来“说书”。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很会打鼓说书的盲人,姓阮,五十多岁,他不但鼓和快板打得好,书也说得特别流利动听。他有一副好嗓子,声音浑厚洪亮,他边说边唱,有时如轻飘飘的春雨滋润心田,有时又像夏天的炸雷那样动人心魄。百十号人的书场,除了阮师傅说书的声音外,几乎听不到其他人的任何响动,那时人们都极度聚精会神,仿佛一有响动就错过听书似的。说到紧要处,阮师傅先是轻而又轻,然后猛然一跺脚,声音突然加重,说到悲恸动情处,他的声音带着哭腔,像楚剧里的“大悲亚”,把听书人的心都牵动了。

我最喜欢听阮师傅说书了,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对听人讲古便有了瘾,虽然我当时只有十来岁,但对阮师傅说的书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只要是阮瞎子来村里说书,哪怕再晚我都要坚持听完,有时晚到快转钟了,我也没有一点睡意,不像其他小孩,到九点钟就去睡了。尽管父亲催我早点睡,我也不会离场。阮师傅说书很有些年头了,多年的说书经历不但让他把那些故事情节背得滚瓜烂熟,同时也让他增长不少说书的能力和技巧。他在我们那一带方圆二三十里都很有名。每年冬天,请他说书的人往往要排队提前定好日子。

阮师傅说书常常喜欢卖关子,这也是他说书的技巧之一。往往说到故事的紧要处,他就要中途停下来,趁这工夫喝杯茶、抽根烟,让人对故事特别的牵肠挂肚。就像我后来看一些古代长篇故事书一样,“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我因为爱听书,听了几回便晓得他快要卖关子了,他刚停下来,我就连忙将茶杯递到他手上,然后赶紧出去撒泡尿,尿撒完了立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“喝了一杯茶,抽了一根烟,让老少爷们等了半天。”阮师傅喝完茶抽完烟后,又来了两句“过门”,然后就又接着先前的故事开始继续说书了。而且越是到后来,他就越是说得更精彩了。

听他说书,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,同时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的声音太好听,他说的书太迷人了。我常常想,他是一个盲人,怎么能把那些故事演绎得如此精彩美妙呢?那些故事情节,他说得与古书上竟是丝毫不差,不由人不敬佩。我想,阮师傅的记忆力真是超强,他又不能看书,这些故事肯定都是听别人讲后才记下来的,他真不是个凡人啊!

有一回,我带着一种敬意,问父亲:“阮师傅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呢?”父亲说:“他是盲人,盲人的心是最静的。心一静,就没有杂念,记忆力自然就好了。”直把我说得云里雾里。阮师傅说一部书往往要四五夜才能说完。我那时正读小学三四年级,每天夜里都是不知疲倦地听他说完书后才睡的。特别是故事讲到中途,心就惦记着后面,每晚巴不得天快快黑。

在我们学校,我的记忆力好是出了名的。那时兴读“老三篇”,全校一百多个孩子当中,我是唯一一个能一字不漏地背诵“老三篇”的学生。二是我的嗓音特别好听。在学校宣传队,我是声音最好的独唱演员,只要是我唱完歌后,总会有长长的掌声出现。我深深地相信,如果我跟了阮师傅学打鼓说书,肯定会成为他的一名关门弟子和得意高徒。

一晃离阮师傅打鼓说书快五十年了,他早已作古,但那些“打鼓说书”的精彩情节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,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还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,那是我童年最难忘的日子,也是最幸福的时刻,如今想起来,还真有些怀念……

## 人皆喜欢“戴高帽”

■ 安徽合肥 周彪

中国老百姓习惯性地就把吹捧人、说好听话称作“戴高帽”。戴高帽一词最早出自唐人李延寿《北史熊安生传》。一个叫宗道晖的基层小吏,平时喜戴顶高帽,脚穿木屐。每当有上级官员到来,他都以这身打扮去谒见。见到上级官员,便仰头,举双手,然后跪拜,直到头叩到木屐上,极尽吹捧。后来人们就把这种行为称为戴高帽。

戴高帽在民间通常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种润滑剂。如:熟人很长时间没见,偶然相遇,总要说两句嘘寒问暖的话:“哎呀,您老哥几年不见还是那么健壮,一点没有变化。”另一方也会笑脸相迎:“您老弟也还是那么帅,帅得让我嫉妒。”俩人哈哈一笑,各自满意而去。再如,遇到几年未见的女同事,通常会说:“哇哉,美女还是这么年轻啊,一点没有变化。”美女也会乐滋滋地回应:“你就会给我戴高帽。”其实心里则是美美的。

“戴高帽”一旦到了官场就容易变味了,成为下级官员讨好、巴结、吹捧、拍马上级官员的代名词。清朝时有一位才子叫袁枚,二十多岁就当上了知县,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或县委书记,进步是相当快的。赴任前,特意去老师那里告辞。老师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知县,你可要好好准备呀。”袁枚说:“老师,我没有特别特别的准备,只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,见人送一顶就行了。”老师一听很不高兴,说:“为官要正直,你是读书人,怎么能搞这一套呢?”袁枚立马回答:“老师说的有道理,可当今世道,有几人能像老师您一样不喜欢戴高帽子呢?”老师一听立刻转怒为喜,师生之间高高兴兴地作了告别。

袁枚从老师家出来后就感慨地说:“我准备的一百顶高帽子,还没有上任,已经送出去一顶了。”喜欢戴高帽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。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不喜欢好听的话,没有人不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肯定,普通人如此,圣人也难免俗。太史公在《孔子世家》中记载,孔子周游列国,受困于陈、蔡,缺粮少水,身不由己。面对困厄,孔子问子路:“难道我们的学说不对吗,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?”子路就实话实说:“大概是我们还不够仁、不够智吧,所以人家都不愿实行我们的学说。”孔子听了很不满意。

见到颜回又问:“回啊,我们的学说有什么错误吗?”颜回说:“老师的学说极为博大,所以,天下没有人能容纳。不研修学说是我们的耻辱,不能采纳我们的学说是各国当权者的耻辱。”孔子听了非常高兴,笑容满面地说:“好小子,假如你有很多财产,我愿当你的管家。”这又是一对师生,学生情不自禁地给老师戴高帽子。孔子在这里不仅接受了学生送上的高帽子,还忘记了自己一贯倡导的“事不有成,反求诸己”的原则,无意中还返送给学生颜回一顶高帽。

“戴高帽”的是与非不可一概而论。对于那些身处官场,想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人,对上刻意巴结、吹捧、迎奉、谄媚,污染官场环境,必须予以无情痛斥!如果是同事之间、熟人之间、师生之间,甚至于上下级之间,出于善意的、有分寸的、适度的戴戴高帽,不仅不会伤害人,且还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消除隔阂,促进人际关系的健康和谐,毕竟,良言一句三冬暖。

## 我们家的“情绪垃圾”分类

■ 山东淄博 李秀芹

我们家的垃圾分类一直做得很好,因为老伴是个“财迷”,苦日子过来的,别说自己家里的垃圾了,就是垃圾桶里的垃圾,他没事也扒拉一下,看到有用的也拣出来拿回家变废为宝。连我们家的孙子孙女也知道垃圾分类:废纸箱、用过的本子放一块儿,喝过的饮料也会区分哪些可以当废品卖,哪些是废铁,哪些是废铝,当然老伴也跟他们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,哪些可以回收再利用,哪些是有害垃圾、如何安全处理等。

一天我和老伴因为一件琐事发生了争吵,孙女突然冒出了一句:“情绪垃圾如何分类?”这句话问得我和老伴都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到了晚上,老伴和我约定,以后遇到问题可以商量,可以讨论,甚至可以辩论,但不可以带着情绪吵,语言暴力属于垃圾情绪,还是垃圾情绪里的有毒情绪,不仅伤害到夫妻感情,还伤害到身边家人。

我和老伴达成共识,以后有火气控制不住了,便“离家出走”,到外面散散心,找老伙计玩

一会儿,聊聊天说说话,或运动锻炼一下,等情绪稳定了再回家坐下来谈。和颜悦色地谈问题才可以让问题得以解决,而带着情绪和火力谈问题,那不叫谈,那叫吵,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只会激化矛盾。这些道理我和老伴都懂,但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,理论和实际很难达到统一。要不是孙女提出了这个问题,我和老伴也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那天老伴趁大家都在,谈了自己的看法,说以后从我俩做起,在家里实行情绪垃圾分类,有问题有不满可以提,但要心平气和地说出来,大家可以当评委,帮着评判一下对错。但如果带着火气带着情绪谈问题,那么大家有权将其轰出去,让其到外面冷静冷静,心情平复了再回来。家庭委员会是全体家庭成员,孙女孙子也在其中,他们也有话语权和“驱逐令”。

自从我家开始实行“情绪垃圾”分类,家庭气氛和谐“环保”了不少,最关键的是老伴今年越来越爱锻炼了,大半年都没生过病。